

# 高僧隐元东瀛开宗的现代启示

——刍议黄檗宗东传日本的条件

◎ 李铭佳

DOI:10.16805/j.cnki.11-1671/b.2017.0244

南明永历八年<sup>[1]</sup>(1654),中土动乱不堪且异族称霸,怀揣着弘法理想与热切愿望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隆琦,在日本长崎兴福寺<sup>[2]</sup>住持逸然性融<sup>[3]</sup>等人第四次恳切的启请之下,做出了东渡日本的重大决定。同年五月十日<sup>[4]</sup>黄檗山僧俗二众依依不舍,护送隐元一行南下泉州府同安县中左所(厦门),其中廿余人于六月二十一日起航,乘郑成功所辖船护送出海<sup>[5]</sup>。七月五日到达日本长崎港。在其弟子独往性幽编纂的《黄檗隐元禅师年谱》<sup>[6]</sup>中解读了隐元东渡的心理状态:亦厌观京华寥落,文物销沉云尔。其深心岂易为流俗人言哉。<sup>[7]</sup>

面对不可避免的“亡国”现实、异族统治,作为出家人的隐元选择东渡海外,弘扬“祖道”<sup>[8]</sup>。这种为保故土文化而寻求海外天地的深谋远虑,可说是隐元对家国命运的抗争和超越。同时隐元在初抵长崎时即作自赞,认为日本政治稳定、佛法尚落后,大有“喜黄檗之将成”<sup>[9]</sup>的自信心。正是:

乐扶桑之太平,发天地之中和,礼万物之枯荣。一叶西来祖道东兴,猗欤伟哉民莫能名。<sup>[10]</sup>

隐元隆琦(1592-1673),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普通商人家庭,28岁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法号隐元,法名隆琦<sup>[11]</sup>。作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代正传,密云法子费隐通容的法嗣,隐元赴日之前,曾两度应请住持福清黄檗山,计17年的住持岁月里令黄檗山大为振兴,宗风盛于江南,一跃为明代禅宗弘法重心之一。赴日后的余生20年,隐元又将临济宗黄檗法脉在日本开基扎根,黄檗宗不久即成为日本江户时期影响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且这种影响力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所说:“近世日本的社会进步,无论从哪方面看,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法解释。”<sup>[12]</sup>由于影响之多之大实难一一列举,笔者将黄檗宗广泛而深远的“江户现象”粗略总结为三个层面:一是审美风向,二是技术革新,三是思维方式。对于后世所统称的“黄檗文化”,笔者毋宁认为是以一种“黄檗审美”为主导,由宗教界横向扩展到江户社会,由上层人士自上而下地纵向扩



展到普罗大众中的风向。京都万福禅寺壮丽的晚明南方佛寺建筑风格,黄檗禅僧们善品鉴、精诗文、擅书画的高雅文人趣味,极大震动日本僧俗,是他们促成了“唐样书风”“文人画”“南画”的产生与发展。“文人画”的清雅淡逸,再逐渐由上而下融入普通民众的审美中,对“唐样”的模仿因此重开时尚风气。再如“煎茶”茶道代替“抹茶”“普茶料理”;素食受到追捧、“隐元豆”的种植食用、主宾落座礼仪,及四人对坐而食等新习俗的普及,与其说是对习俗内容的欣赏学习,倒不如说是对以隐元为代表的黄檗团体之风貌的追逐崇拜了。对黄檗美学的追捧,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对技术的学习与传承上,这些技术覆盖江户时期社会民众的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最后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民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他们的生死观、自然观、修行观等等生命哲学、审美哲学中。

对比后世的辉煌,反观彼时初抵异土、年逾60的隐元,眼前面对的东瀛弘法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他奔走过、徘徊过;受过排挤、承过压力;一边是故土殷切的催归,一边是他乡迷茫的前途;所幸他支撑下来,守得云开见月明。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团的殊胜、政府的支持,以及针对东瀛佛教的种种乱象而做的对症下药,是隐元东瀛开宗并弘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条件。

## 一、法团殊胜

### (一)法嗣追随

新开黄檗壮禅基,正脉流传海外奇。

有志英灵须着眼,苦心道义共扶持。<sup>[13]</sup>

1654年陪同隐元东渡并留在长崎弘法的弟子有慧林性机<sup>[14]</sup>、独湛性莹<sup>[15]</sup>、大眉性善<sup>[16]</sup>、南源性派<sup>[17]</sup>、独吼性狮<sup>[18]</sup>等二十多人,这几位虽不是他们门下数一数二的法嗣,但个个是龙象。待到1655

年中左所出发的木庵性瑠和1657年从浙江温州出发的即非如一齐赴长崎,隐元黄檗宗十个法派的初祖已聚集七个。

木庵性瑠(1611-1684),泉州吴氏,黄檗宗紫云派开祖,是隐元在日本建寺立宗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日本黄檗山万福禅寺第二代住持,同时也是隐元弟子中法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位。除了禅法过人之外,他也是一位诗书画卓然成家的大文豪,与隐元、即非并称“黄檗三笔”<sup>[19]</sup>,对当时日本书法界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即非如一(1616-1671),黄檗宗下第二大派系广寿派开祖。他历住福州雪峰崇圣寺、日本长崎崇福寺、小仓福聚山等名山巨刹,著作宏富,不论在中国明清佛教史,还是江户佛教史上都有重要地位。除“黄檗三笔”的美名外,即非的诗作在高产之余还用词精妙,更饱含爱国深情,在当时的日本文坛极受赞誉。作为林希逸<sup>[20]</sup>后人,他据家传旧本所校注的《即非老子经》在江户日本广受欢迎,其三教合一思想<sup>[21]</sup>也是黄檗门下一大特色。木庵、即非两人个人学养俱为上乘,在日本又培养了大量优秀黄檗生徒,被后世并称黄檗宗二甘露门。

### (二)名士皈依

在隐元赴日弘法的整个过程中,有不少明朝杰出人士,他们或为文豪、或为武将,皆因有感于隐元的民族气节、弘法大愿和高尚魅力,毅然皈依佛门,辅助隐元。如独往性幽<sup>[22]</sup>、独耀性日<sup>[23]</sup>、独立性易<sup>[24]</sup>等,其中独立性易在黄檗宗东传过程中贡献巨大。独立性易(1596-1672),原名戴笠,出身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sup>[25]</sup>,明亡后矢志抗清,与抗清志士、明朝遗民朱舜水<sup>[26]</sup>颇有交往,南明永历七年(1653)正月,因对时局绝望,58岁的戴笠远渡长崎。翌年十二月八日在长崎兴福寺从隐元出家,法号独立,法名性易。独立精通诗文、医

术、书法、篆刻、建筑<sup>[27]</sup>等,堪称明文化全才。他在辅助隐元弘法日本的同时传播明文化,于传播种痘医术、篆刻艺术方面更具有开创之功。<sup>[28]</sup>

### (三) 日僧感佩

从隐元决定东渡开始,长崎三福寺僧团与众檀越就翘首以盼,而长崎以外的日本各地,本土僧侣们也纷纷赶来,除临济宗、曹洞宗的僧侣外,真言、天台、法相等宗派皆慕名谋面求示。龙溪宗潜(1602-1670)<sup>[29]</sup>就是其中的代表。龙溪出身日本京都奥村氏,15岁出家。隐元东渡时他已是京都妙心寺住持,是江户时期临济宗的名僧。他早在三年前就读过《隐元语录》二卷,隐元渡日的消息使他欣喜若狂。1654年七月<sup>[30]</sup>赶到长崎恭迎隐元,一见即为其禅风倾倒,决意邀请隐元入京都弘法。无奈妙心寺内反对派强烈抵抗隐元进住,招请隐元住持的活动终告失败。然而龙溪拥护隐元的立场始终不变,转而说服幕府建立新寺以挽留隐元,并甘心放弃妙心寺住持地位嗣法于隐元,成为黄檗派禅僧,重取法名为性潜。

在说服幕府挽留隐元,进而辅助隐元开山建寺的过程中,龙溪不辞辛劳,多次奔波于江户与京都之间。龙溪努力了整整5年,终于在1659年五月等到幕府赐地建寺挽留隐元的决定。1661年四月,龙溪与慧林性机代表隐元前往江户,谒见将军表达谢意。五月八日,隐元命名新寺为黄檗山万福禅寺,着手建造。1663年一月十五日,隐元于新成的京都黄檗山万福寺开堂说法,为国祈福祝圣,幕府官员与日本佛教各宗代表都参与了这一盛会。这标志着隐元为首的黄檗宗法系东渡弘传事业的正式展开,以幕府将军德川家纲为檀越的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至此建立。龙溪的献身支持终结硕果,可谓是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的开山功臣。

隐元1654年初到东瀛,活动仍被限制在长

崎一带,但到他真正深入江户腹地,获得幕府任命开山创派,仅仅花了5年时间。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江户,对一位外籍僧人来说,这样的功绩光靠隐元一行二十多人及唐人华侨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龙溪之外,隐元在日还有独照性圆<sup>[31]</sup>、独本性源<sup>[32]</sup>等法嗣,正是有了龙溪等日本僧俗奔走鼎力,让法团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得以共结殊胜的因缘。

反观当下,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尤其在战略开展初期,优质的人才不可或缺。具有人脉优势的当地华侨华人是开路先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各界学者和科研人才是推进保障,此外大力度培养相关领域的小语种人才也很有必要。

## 二、政治保障

六载寓扶桑,乌藤横海岛。  
不愁云水笼,莫羨熏风早。  
特地自翻身,笑吟归去好。  
谁知长者闻,赏音妙节操。  
大言炎不华,上意重珍宝。  
瑞光贲远人,择地净如扫。  
金汤沸且严,令法久长保。  
盛世大典章,中兴佛日杲。  
大哉育物心,霜露及时到。  
中外悉皆临,知恩洪莫报。  
默默仰苍苍,无疆是所祷。

——己亥季夏承上旨意留附京开创,隐元隆琦作<sup>[33]</sup>

### (一) 幕府支持

虽然有福清法嗣、故土名士和日本高僧的鼎力护持和忠恳追随,但身处异土开基谈何容易?在初到长崎的1654-1659年的5年间,隐元的弘法之路可谓波折重重,而其最终成功,很大程度

上归功于日本执政幕府的倾力支持。

当隐元初登长崎时,就已引起幕府方面的注意。他的名声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远,以至于长崎附近的百姓,乃至京都妙心寺的僧人都赶赴长崎听法;他的僧团如此紧密而坚定,对长崎一代的唐人号召力极强<sup>[34]</sup>,如果弘法是假,搅乱政局是真,那后果不堪设想。在弘法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隐元也一时对前景满怀乐观,应龙溪邀前往京都,打算先暂住摄州普门寺,再择日进住妙心寺,更连续发信召令留在国内的木庵和即非。不料刚至普门寺即被幕府软禁,时间长达一年。幕府方面怀疑隐元不为弘法,而为政治、军事目的而来。

转折点是前京都所司代<sup>[35]</sup>板仓重宗<sup>[36]</sup>的出现,1655年十月十二日,板仓重宗到普门寺会见隐元,考察其来历。初次会面时板仓绵里藏针,称“贵邦广大,恐此土狭小,不称师意”,但隐元强调国不论大小,贵在为政者的德行。反过来敦促板仓等幕府官员要“摧邪扶正,令法久住”,再次表达自己“起三百年祖风,以报佛恩”的弘法本意。此次会面赢得了板仓的信任和倾慕。十月十九日,他再次访问隐元,把话题转向了参禅,问答之间透露禅机。此次问答后板仓皈依三宝为佛弟子,隐元为之取法名性空,板仓更立即启请隐元在普门寺开堂说法。当年十一月板仓亲自参加了隐元的开堂法会<sup>[37]</sup>,与前面两次在长崎兴福寺、崇福寺以唐人为檀越的开堂不同,普门寺开堂是以德川幕府的代言人、前京都所司代为檀越的。这说明隐元黄檗派开始得到幕府的直接保护,向日本上层社会逐步展开。此后虽然有京都妙心寺的晋山不顺,动摇了隐元的弘法愿景<sup>[38]</sup>,但最后在龙溪性潜的奔走、幕府老中<sup>[39]</sup>酒井忠胜的牵线之下,隐元一行往江户觐见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并最终获得了日本最高权力者的高度认可和信

任,等来了幕府建新寺挽留的决定。幕府对隐元弘法的态度经历了监视阶段、信任阶段和扶持阶段。正是隐元在面对幕府时始终表现出的冷静、自信、宽容与坚持,才有了这三个阶段的递进与转变。

## (二) 皇室皈依

虽然江户时期武家才是实际掌权者,但皇室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依然有不可替代的威严与影响。而隐元不但取得了幕府的大力支持,也以其个人魅力和禅宗修养深得日本皇室的敬爱。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文英夫人的敬仰、后水尾法皇的皈依和灵元天皇编撰的《桃蕊编》<sup>[40]</sup>。文英夫人原出身贵族<sup>[41]</sup>,丧夫后奉召在宫中养育刚出生的皇子<sup>[42]</sup>。隐元入住靠近京都的摄津普门寺以后,文英夫人经常拜访请示,来往间将隐元的事迹及其临济宗黄檗派的禅风影响于日本上流社会,给当时身处弘法困境的隐元莫大的支持。<sup>[43]</sup>

后水尾法皇(1596-1680)是灵元天皇的生父,年少隐元4岁。法皇在日本庆长十六年(1611)16岁时即位,34岁让位,56岁在京都相国寺剃发出家。隐元渡日时,法皇已剃发3年,在宫中专心从事文教与修行<sup>[44]</sup>。按照当时日本皇室的规定,天皇不接见外国僧人,所以法皇与隐元没有会面过,主要通过隐元法嗣的日僧龙溪性潜等人展开交往。法皇倾心于隐元的禅风。1663年五月二十五日,法皇通过龙溪性潜向隐元请教禅宗心要。隐元以呈递法语的形式作了书面回答<sup>[45]</sup>。后水尾法皇的问法,意味着隐元及其黄檗宗在得到德川幕府认可的同时,也得到了日本皇室的正式认可。

在当时幕府掌握政治、皇室代表文化的二重构造的日本社会中,隐元及其黄檗宗因而具备了高尚的社会地位。1667年法皇以己事究明的悟境,得到龙溪认可成为法子,属临济宗下第三十

四代。没想到法皇竟成了龙溪唯一的嗣法弟子,三年后的1670年八月十五日,龙溪应请到摄津西成郡九条岛住九岛院,因暴风雨突袭不幸遇难。这个突发事件令法皇与隐元深受打击,且法皇身份地位特殊不便直接授徒,黄檗宗内龙溪以下的法系传承,因此成为了一个问题。隐元态度审慎,希望法皇独力受持,回信道:“今正统会下虽未有人,唯冀陛下勉力受持,以寿将来,俾佛日重光无尽,是山野之至望也。”法皇最终承接了隐元的法系<sup>[46]</sup>,在其故后的1685年四月,高泉性激遵照遗命,以法皇遗留的诗偈与拂尘付与晦翁宝。从此,黄檗宗内由法皇继承的龙溪法脉,得以流传,至于今日。

作为两位年近80的老人,作为同是长期实践佛法的修行者,法皇与隐元虽然从未谋面,但两人的情谊超越生死,更超过了一般师徒或君臣的关系,二人生前曾有大量的来往诗信,或为问答,或为赞颂。法皇逝后,其子灵元天皇(1654-1732)敕令编撰并亲自作序的《桃蕊编》<sup>[47]</sup>,将隐元东渡、开山,与自己出生、即位的时间巧合加以联系,在显示皇室高尚的同时,也大为赞扬和尊崇隐元的德行,《桃蕊编》也因此黄檗宗、日本皇室中流传,影响至今。隐元重病期间,法皇叹道:“师者国之宝也,倘世寿可续,朕愿以身代之。”<sup>[48]</sup>法皇对隐元这样的敬慕,是令人感动的。而由法皇开始的对隐元的国师封号,成了后世皇室执行的一个惯例。

### (三) 世代追嗣

隐元逝世的前一日,后水尾法皇赐给他大光普照国师封号。此后,在每隔50年的隐元忌日,日本皇室给隐元追加封号成为了惯例。迄今为止,日本皇室六次赐予隐元封号,即大光普照国师、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觉性圆明国师、真空大师、华光大师。

1872年是隐元寂后第二百年,由于处于幕府被推翻、皇室复辟的过渡阶段,皇室似乎无暇考虑隐元的封号,只于1882年由宫内省发出公文,通告明治天皇赐京都黄檗山亲笔竖额“真空”,五年后才加封隐元以真空大师号。

1972年三月,昭和天皇加封隐元以华光大师号。这一年恰好是中日关系彻底改善的一年。1972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两国在北京发表了共同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隐元的华光大师号,也让热爱中国文化与黄檗文化的人们感到欣慰,并引起对中日友好的更多期待<sup>[49]</sup>。隐元在中日交流史上的崇高地位,或许将来还会通过日本皇室的追封而体现出来。

隐元东渡日本,弘传鲜活先进的佛法和高水准的汉文化,不仅创立了日本最后一个佛教宗派,也以覆盖面极大、渗透极深的“黄檗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江户文明”。其影响持续久远,至今仍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因此,隐元东渡不仅是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是东亚文化内部交流、共同实现东亚海洋文明的盛举,更是东方文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不同于“古海丝”上灿烂的中华文化传播史,现在,周边国家比较认同的是中国的“硬实力”,但是对“软实力”的认可很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说,任何国家都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另一条腿则是文化软实力<sup>[50]</sup>。物质硬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一打就败;而文化软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不打自败。习近平还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sup>[51]</sup>因此如何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如何从文化传播领域投入“新海丝”建设,是一个需要持续加强重视的问题。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扶持上,在与合作伙伴国及地区的谈判上,都应对文化领域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 三、对症下药

一声荼毒闻皆丧,遍野骷髅没处藏。

三寸舌伸安国剑,千秋凜凜白如霜。<sup>[52]</sup>

——崇祯七年隐元求法偈颂

在崇祯七年(1633)一月向费隐求法印时所作偈颂中,充分体现了临济宗风本身刚健燥辣的魅力。作为费隐通容座下的临济宗法脉第32代正统<sup>[53]</sup>,隐元曾在应对日僧瑶林质疑《复示瑶林善人》<sup>[54]</sup>中说:“自东来此土,迄今十载,专行济北之道。”此时隐元已有73岁高龄,禅风可谓圆熟,自认平生以弘扬临济禅风为己任。黄檗宗及黄檗文化之所以能在东瀛开花结果,立宗开派,首先在于其作为临济宗正传的宗风魅力。但彼时日本佛教已宗派林立,黄檗宗能够开出还与江户佛教整体趋衰、急需外援有关。当时的日本佛教乱象具有政治化、世俗化、保守化三大特点。

#### (一)政治化

明清之际,日本处于幕府统治下,以幕府将军为首领、武士为主体的武家,将京都皇室为代表的公家傀儡化,成为实际掌权者。而佛教作为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自然成为了幕府的重点控制对象。不同于对天主教的残暴镇压<sup>[55]</sup>,在对待佛教的策略上,幕府首先想到的是为己所用,以便于禁止天主教,配合儒教巩固幕府的思想统治。此外,织丰时期的频繁战事,崩坏了佛教赖以生存的庄园经济,幕府则借机重新划分佛教界势力范围:一方面削弱以京都为中心的,与皇室及公家关系密切的西部地区“朝廷佛教”;另一方面扶植培养以江户为中心的,忠心于将军的东部地区“幕府佛教”<sup>[56]</sup>。利用自天武天皇以来的本末寺传统,幕府重新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法令<sup>[57]</sup>,如《禁中并公家诸法度》<sup>[58]</sup>中的相关规定、寺院诸法度、檀家制度、本末制度<sup>[59]</sup>等。“本末制”将原本只停留于法系联结的本寺与末寺,变

成了实质性的隶属关系;而岛原之乱后,加强并推行于全国的“寺请制”<sup>[60]</sup>则名为管理,实为控制和监视百姓。佛教因而阶层化、官僚化,彻底地政治化了。

#### (二)世俗化

到了1654年,幕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政局稳定伴随着经济发展,将扶植与抑制并存的佛教政策固定了下来。严格的寺檀关系,使得寺院由布教道场,逐渐演变为管理民众的幕府地方政权机构。僧侣处于监视民众的特殊地位,而异化为官吏。他们陷入更多的世俗事务,权力过剩而不思修行;他们收入丰厚却无需缴税,衣食有余而日益腐败。在国家权力与稳定经济收入的双重温床中,江户佛教僧风沉寂、民心离散。尤其在宗派及义理上久无发展,日本佛教可说整体失去了活力。

#### (三)保守化

武士阶级倾向于简易明了、直指人心的宗教精神,旧有的以研究经典和祈祷法会为主的佛教(天台宗、真言宗)因不能适应他们的意识形态而逐步衰落。“禅宗以其修行单纯、决断、自恃、克己等戒律般的精神力量深得武家之心。”<sup>[61]</sup>但政治化和世俗化直接导致了日本佛教的情怠不前,集中体现在义理发展方面。不同于旧有“朝廷佛教”高僧的精进修学,幕府新扶植的效忠僧侣多为庸俗之辈。此外非佛教徒的贵族子弟代表公家,也拥有解释和教授经典的权力,加上经典少、诠释旧,难以满足信众的期待和需求。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当时日本上下对中国大陆禅宗的强烈求知。

此时,保持中国大陆佛教传统戒律的隐元一派,携带着先进明文化而来。隐元及其弟子“虽遭亡国之痛,而志气不堕,饱经忧患而节操昂然”<sup>[62]</sup>。他们强劲的精神力量、刚健的面貌及新颖的格调,如空谷跂音震醒了当时的日本佛教

界。黄檗宗在临济宗风的燥辣之外,又兼收并蓄了净土宗的念佛与律宗的持戒,给日本佛教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在《复示瑶林善人》中,隐元概括了其裹挟禅风的三个基本特点:静坐参禅为根本的修行法门;引自净土为方便的念佛方法;严守戒律并重威仪的持戒传统。其中,重视静坐参禅,宣扬临济宗风,是隐元禅风的活力及魅力所在,但文中主要回应瑶林质疑的,则是其对净土宗念佛号的引入。作为中国佛教中两个重视实践、普遍流行的宗派,禅宗与净土宗在唐代就出现了融合的倾向,到明末禅净合流已成大势。但从现存语录可以看出,隐元虽肯定净土宗持名念佛的妙处,但仍是坚持以参禅为本位的。<sup>[63]</sup>

其次,《复示瑶林善人》中还说:“老僧自开堂三十余载,凡剃度弟子,即令受沙弥十戒。至年长,次第登坛受具,付三衣一钵。及到此土,并未闻有受戒之事……此方之众,亦不忘着衣持钵,但只是名色而已。甚至钵盂作酒器,可不哀哉?!”<sup>[64]</sup>隐元禅风本就提倡严持戒律、重视僧众威仪;针对日本佛教界的堕落糜烂,他更以大力弘戒为己任。1658年,隐元在摄津普门寺刊刻《弘戒法仪》,规定了僧人出家后,应该次第接受的三坛大戒<sup>[65]</sup>;1663年十二月一日,隐元在京都黄檗山首开三坛大戒<sup>[66]</sup>,重新把中国佛教的守戒传统传播于日本社会。此外于京都黄檗山教团与黄檗宗的内部管理上,隐元制定了《黄檗清规》,使得黄檗宗依照明朝佛教的模式发展保持独立性,这也刺激日本其他的禅宗派别整理恢复自己派内的清规。

除了为日本佛教注入净土色彩和重树戒律之外,隐元及其法嗣以高深的宗教修养和深厚渊博的学识,讲经立说,在佛教经籍的整理注释、法统及禅宗史梳理、佛教仪式梵呗、寺庙建筑结构等等方面,皆有可观的成果;且黄檗宗在培养杰

出禅僧方面也建树颇丰,成功地把中国人传播的临济宗,转换为日本人传承的黄檗宗。例如,木庵弟子铁牛道机法源广被,仅开创的黄檗宗寺院就达十几所,遍布日本四岛;木庵弟子潮音,兼学神道儒,有《做禅论》《雾海南针》《大成经破文答释编》等流传于世;木庵弟子铁眼道光,集资主持《大藏经》的雕印工作,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花十数年<sup>[67]</sup>完成共6771卷的黄檗版《大藏经》<sup>[68]</sup>,使得佛经等能够普遍传播于一般社会民众。

综上所述,隐元东渡之所以能够结出硕果,成为“古海丝”上中国主动走出国门传播文化的成功案例,除了隐元隆琦的个人魅力和宗教修养外,更离不开其储备优质的人才资源、争取有力的政府支持,并注意在思想文化传播过程中结合特定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发挥自身特长。而人才资源、政府支持、因地制宜这三点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挖掘开发其为文化交流之路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和挖掘价值。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因促成了隐元东渡等文化传播的成果而提升了东亚内部的对话交流;而东亚这一场域下和平发展的成功,作为全球化的缩影,亦可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新模式的一个试金石,隐元东渡弘法也因此具有了典范意义。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 注 释:

[1]明灭之后,黄檗僧人的书面记录全部采用南明年号,因此本文以东渡时间1654年7月为界,此前沿用明朝及南明年号,此后为方便阅读,统一采用西元纪年。

[2]唐人东渡长崎后先是兴建妈祖祠堂,遇阻力后开始创建寺院。其中,长江下游出身者建成兴福寺(俗称南京寺);福建泉州漳州两府出身者建成福济寺(俗称漳州寺);福建省福州府出身者建成崇福寺(俗称福州寺)。此三寺并称长崎“三福寺”。见〔日〕文斋信春:《长崎土产》,日本弘化四年(1847)刊本,爱知县黄檗堂文库藏。

[3]逸然性融(1601-1668),逸然于1634年以药材商人的身份东渡长崎,于崇祯十七年(1644)出家,翌年入住兴福寺。逸然善于丹青,被尊为日本近世汉画之祖。参考任萍:《浙江籍侨僧逸然性融与日本》,载《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2,第71-77页。

[4]文中日期皆为农历,因此不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5]平久保章:《隐元》,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年,第88-89页。

[6]《黄檗隐元禅师年谱》(初刊本),日本承应三年(1654)十月刊,京都黄檗山存。

[7]独往性幽:《本师隐大和尚传赞》,《黄檗隐元禅师年谱》出刊本附录。日本承应三年(1654)十月刊本,京都黄檗山存。

[8]禅宗临济宗一脉。

[9][10]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隐元全集》,东京开明书院,1979年(以下简称《全集》),第2539页。

[11]一说隆琦为他俗家名字,此处以《黄檗隐元禅师年谱》为准。

[12]柳田圣山:《近世日本佛教の改革——隐元》,载《禅と日本文化》,东京:讲谈社,1992.6,第186页。转引自林观潮:《隐元隆琦禅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13]隐元于1661年初到京都黄檗山吟咏的心境,见《全集》,第3499页。

[14]慧林性机(1607-1681),福清郑氏,隐元门下第十六位法嗣,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第三代住持,开出黄檗宗龙兴派。参考高泉性激著《东渡诸祖传》二卷,江户刻本,京都黄檗山存,下同。

[15]独湛性莹(1628-1706),莆田陈氏,隐元门下第十八位法嗣,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第四代住持,开出黄檗宗狮子林派。

[16]大眉性善(1614-1673),泉州晋江许氏,隐元门下第十九位法嗣,开出黄檗宗东林派。

[17]南源性派(1631-1692),福清林氏,隐元门下第二十一位法嗣,开出黄檗宗万松派。

[18]独吼性狮(1622-1688),福清朱氏,隐元门下第二十二位法嗣,开出黄檗宗万松派。

[19]参考解小青:《明末黄檗禅僧与日本书法——以黄檗三笔隐元、木庵、即非为中心》,载《中国书法》,2011.9,第71-77页。

[20]林希逸(1193-1271),南宋最后一位理学家,字肃翁,一字渊翁,号竹溪,又号虞斋。著有《竹溪十一稿》九十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已佚。今存《竹溪十一稿诗选》一卷、《竹溪虞斋十一稿续集》三十卷。事见《宋元学案》卷四七等。儒、道、佛在东亚文化圈尤其日本,影响极大。

[21]关于这点,主要参考池田知久教授的说法。参见池田知久:《林希逸庄子——虜斋口义在日本》;周一良译,载周启成校注:《庄子虞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517-533页,特别是第525页部分。

[22]独往性幽,原名欧琪,字全甫,福州府侯官县人。永历六年(1652)投黄檗山跟从隐元出家。协助隐元著有年谱和语录,流传日本,最后从戎战死。

[23]独耀性日,原名姚兴,字翼明,浙江省海宁县人。明亡后,他起兵抗清,监国鲁王授他职方主事。永历六年(1652)冬,依隐元出家,落发为僧。独耀道德文章俱佳,深得隐元信任,执掌记室,成为隐元的重要弟子。参与及编集《颂言》,撰写《隐元禅师年谱》,营葬钱肃乐,帮助隐元东渡日本。

[24]独立性易,原名戴笠,又字曼公,号荷鋁人,天外一闲人,天闲老人,就庵,出身于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先祖为东晋名士戴安道。

[25]见高玄岱《明独立易禅师碑铭》,现存于日本埼玉县新座市野火止平林禅寺境内戴溪堂中。

[26]朱之瑜(1600-1682),明清之际学者、教育家,字楚屿,又作鲁屿,号舜水,汉族,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人称征君。南明亡后,东渡定居日本传播儒学,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著有《朱舜水集》。

[27]1664年四月到八月,独立于岩国(今山口县岩国)为吉川父子诊疗。期间以杭州锦带桥的建造技术,帮助岩国建成五孔相连的拱桥,称为锦带桥。锦带桥保存至今,虽屡经修复,依然保持当年形态,被日本建筑界称为奇桥。2004年,岩国锦川锦带桥与中国杭州西湖锦带桥结为友好姐妹桥,并立碑纪念。

[28]石村喜英:《深见玄岱の研究——日中文化交流上における玄岱と黄檗独立禅师传一》,东京雄山阁,1973年。

[29]后改名为龙溪性潜,黄檗宗万松派开祖,隐元的第十七位法嗣。

[30]因十七世纪中日两国古籍中都还使用农历,因此月份不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而保留汉字大写。

[31]独照性圆(1617-1694年),日本江州富田氏,黄檗宗直指派开祖,隐元的第二十法嗣。

[32]独本性源(1618-1689年),日本房州法木氏,黄檗宗海福派开祖,隐元的第二十三位法嗣,也是隐元的最后一位法嗣。

[33]《己亥季夏承上旨意留附京开创》,《全集》,第2661页。

[34]当时幕府对大陆情势极度敏感,而长崎唐人众多,成分复杂。隐元在唐人社会中威望过重,无形中成为



凝聚唐人社会的中心,这种情况是幕府所不希望的。

[35]京都所司代是德川幕府管理京都一带的最高行政官员。

[36]板仓重宗(1586-1657),日本安土桃山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谱代大名,下总国关宿藩初代藩主、京都所司代。

[37]《五畿内摄州慈云山普门福元禅寺语录》,《全集》,第1756页。

[38]根据《全集》中当时所作的诗偈来看,大多都流露了希望归国的心境。

[39]指幕府重臣。

[40]在后水尾法皇的皇子中,灵元天皇(1654-1732)因为年幼与在位天皇的身份,与隐元并无直接来往。但由于天皇养母园光院文英夫人与生父后水尾法皇崇敬隐元,所以天皇应该从小耳闻隐元等东渡僧人的事迹。灵元天皇出生于隐元离开福清黄檗山准备东渡的当年当月;又即位于隐元于新黄檗山开堂说法、黄檗宗得到佛教界内外正式认可的当年当月。这两个偶然巧合的日期,在隐元圆寂32年后的1705年被灵元天皇载入《桃蓂编》。

[41]据高泉性漱《大悲山圆通寺碑铭》所记载,文英夫人出身贵族,丈夫逝世后,因德行而奉召养育皇子。

[42]就是后来的灵元天皇(1663-1687在位)。

[43]《园光院文英夫人荐夫若州守》,《全集》,第1865页。

[44]在日本历史上,后水尾法皇是少数几个笃信佛教,却能保持理智,稳健修行,且造诣颇深的天皇之一。

[45]《法语》,《全集》,第3233页。

[46]“代付论”“隐元禅师启书”,吉永雪堂写本,京都黄檗山存。

[47]《桃蓂编》三卷,日本宝永二年(1705)藤原韶光编,灵元天皇序。爱知县黄檗堂文库藏写本。

[48]《普照国师年谱》宽文十三年癸丑,《全集》,第5259页。

[49][日]高桥良和:《黄檗山万福寺》,京都昭荣堂,1976年,第259页。

[50]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全球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它与“硬实力”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详见[美]约瑟夫·奈著、马娟娟译:《软实力》,中信出版社,2013年。

[51]转引自张国祚:《文化软实力研究》,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1,第42-45页。

[52]《行实》,《全集》,第853页。

[53]隐元青年时入明末临济宗的中兴人物、天童派开祖密云圆悟会下,后嗣法于密云法子费隐通容,费隐在隐元首次出任福清黄檗山住持时手写的源流,可以清晰地看到隐元所传承为临济宗法脉32代正统。

[54]这封书信是隐元针对日本僧人瑶林对其禅风的三大质疑而作。收入《全集》,第3316页。

[55]室町幕府末期天主教在日本迅速传播,江户幕府对日益强大的天主教势力采取残暴镇压。著名的岛原、天草之乱就是对这种宗教迫害的大规模反抗。

[56]例如,相对于天台宗本山的京都比叡山延历寺,1625年幕府在江户令天台宗僧人天海(1536-1643)创建东叡山宽永寺,升格为天台宗在东部地区的总本山,权力凌驾于延历寺之上。

[57]幕府在创建翌年,即陆续颁布统制各宗派或者个别寺院的法令,至1616年已多达四十多条。

[58]乃江户幕府确立它与天皇和公家关系的法例。

[59]详见[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5-287页。其中本末制在镰仓时期被强化及改造,幕府下令禁止建立新寺,将各地所存古刹全部编入特定宗派。规定本山与所属末寺之间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将末寺置于本山绝对管辖之下,实质上由国家政权完全控制。

[60]寺请制度规定国民都要归属于寺院,成为檀家信徒,负责维持寺院费用及僧侣生活。与之相应,寺院建立宗门户口簿,僧侣具有户籍公证的特权,信徒在结婚、生产、死亡,乃至迁移外出、蓄养奴婢时,都要从寺院获得核查证明,由僧侣参与主持。

[61]铃木大拙著,陶刚译:《禅与日本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8页。

[62]林观潮:《隐元隆琦禅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63]他鲜有提及净土宗念佛的义理与具体方法。即使应请为修行净土宗的弥陀会信众说法,开示也充满禅意。

[64]《全集》,第3316页。

[65]即沙弥戒、比丘具足戒、菩萨戒。

[66]《普照国师年谱》载:“腊月朔日,设为戒坛,用资恩有,计师开堂将三十载,说戒一十六度,受戒弟子不知其数。而此土则成初会,为开戒之祖。四方见闻,莫不归心,至有感激涕零而不可已者,叹戒法之难遇也。”

[67]一说20年,因他三度募集资金,却又两度用于赈灾,自离他发愿印经的时间算起,整整20年。

[68]也称铁眼版一切经、黄檗版一切经,是日本由民间财力支持的首部方册《大藏经》。